

中山大学学术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 文体形态 研究



吴承学◎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学术研究丛书

I206.2
W528

中国古代
文体形态
研究

吴承学 著



A0840348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吴承学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0.9

ISBN 7-306-01686-5

I. 中… II. 吴… III. 文体-研究-中国-古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1091 号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编:510275

电话:020-84111998、84037215)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广东省番禺市市桥印刷厂印刷

(地址:广东省番禺市市桥环城西路 201 号 邮编:511400 电话:020-84881937)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350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傅璇琮

今年四月间，吴承学先生来信，约我为其新著《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写一篇序。刚看到信中所提的书名，马上就想到明代两部文体学著作，即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文章辨体》详列歌谣、赋、乐府、诗及各种骈散文体五十九类，《文体明辨》更细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当时我很担心吴承学先生如何把中国古代如此繁复、琐细的文体作统括全局的概述和分类辨析的细研呢？后来接到来稿，先翻目录，不禁眼光一亮，原来全书十七章，第一章至十二章分别选择了先秦盟誓、谣谶与诗谶、策问与对策、诗题与诗序、留别诗与赠别诗、题壁诗、唐代判文、集句、宋代櫟括词、明代八股文、晚明小品、晚明清言等文体进行个案式的清理与研讨，第十三至十六章则对文体学理论作历史性和逻辑性的梳理，最后一章则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古代以评点形式所显示的文化传播与文化普及行为作出颇有当代意识的评议。以上章节，大部分前些年曾以论文形式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过，当时也读过几篇，这次为了遵嘱写序，就集中把全稿细读一遍。每读一章，说实在话，真有一种艺术享受的美感，又得到思辨清晰、论议深沉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

我想，书序这一文体不是书评，不必对书作全面的介绍和评论，——此书书前的“绪论”也已对本书的宗旨作明晰的阐释。书的序言应当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文体，大致是撰写者的一篇读后感，可以对书作感想式的评论，也可与著者作学术上或友情上的

HAB/02

交流，也还可抒发撰序者本人的某些感慨。就我个人来说，吴承学先生比我年轻约二十余岁，按照友人蒋寅先生《四代人的学术境遇》所述，在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行列中，我算是第二代，承学先生算是第三代，但我总有一种与吴、蒋都是同一代的感觉，因此每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彼此都能促膝而谈，也无“忘年”之感。这样，我这篇序也就随意而谈，无一定之体。

我读这本书，以及读《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晚明小品研究》，曾于灯下默想，承学先生治学有怎样一种路数？于是得出八个字，这就是：学、识贯通，才、情融合。再演绎为四句话：学重博实，识求精通，才具气度，情含雅致。我认为，博实、精通、气度、雅致，确是这些年来吴承学先生给学术同行的一个总印象，也是承学先生一辈中的前列者这些年来在其著作成果中所显示出来的艺术才能和精神素质。

将以上的八个字、四句话，具体落实到这本书，首先我觉得承学先生有一种坚实而敏感的学科建设意识，而学科建设也确是当前古典文学研究界面向新世纪所必须正视和承担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项目。十年前承学先生在复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提出“中国古代文学风格学”，并写有专著，经过近几年的潜心研究，又提出中国古代文学文体学。我认为，这不只是针对目前学术界对文体形态研究的薄弱情况，更重要的是有鉴于文体学研究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有不可忽视的完整学术结构的意义。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的说到：“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到文学自身，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往往把文体单纯看作一种形式技巧，不予重视，这是出于一种偏重所谓政治因素的误解，从而限制研究的视野。如果按“绪论”中所说，我们在建立文体学的过程中，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等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

类感受方式和审美心理及文化心态，这就能促使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

当然，作为学科建设，一方面要有科学规范，另一方面更要有重点突破的创新意识。以古代文体学而论，面对从先秦至近代三四千年间几十种、上百种的文体，要一个个排着队来评述，谈何容易，这也是古代文体学面临的一个客观难题。但我们可以作主观突破，这就是本书的一种创新精神，即先不作系统的概论，而是对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涵义的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从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我觉得这样做，对当前学科建设来说，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我们不要先作大而全的概述性工作，这样难免重复、浅层；先选择有一定代表性的几个点，作精细而又有高度概括的探讨，这就能使这一学科成为富有现代意义的、具有众多坚实实验室的科学园区。

这里提到实验室，我以为人文科学也应该有自己特色的文献材料库，而本书在这方面也颇有建设性的创新点。我在上面曾讲到学重博实，而就现代来说，博实必须注意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在第一章《先秦的盟誓》中，作者表示，他通过现代先进的电子检索系统，得知“盟”字在《左传》中出现 640 次，在《公羊传》中出现 162 次，在《谷梁传》中出现 172 次；“誓”字在《左传》中出现 22 次，在《谷梁传》中出现 1 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出现。又，在《汉字游戏与汉字诗学》一章，作者从《诗牌谱》中摘下开头三十个字，根据北京大学网站《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得出它们在《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分别是：天 17614，云 19029，烟 6176，霞 2008，霜 3813，等等。这样的“总账”式数字统计，并不纯粹是技术性的，它往往会带给人们一种文化探索的兴味。我在一次会议上也曾听《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制作者说过一段话，他说他拿出“夕阳”一词，来检索

《全唐诗》出现次数，结果是初唐时期最少，晚唐时期最多，说与与会者发出会心的微笑。

当然，对我们搞文学研究的人来说，掌握文献材料，不能全靠电子检索，还得靠头脑积累，头脑中的众多积累和有效利用，有时是电子检索不能代替的，它的表现特点是“活”。譬如本书中讲到判文对叙事文学文体（戏曲、小说）的影响，就举出宋代《醉翁谈录》所引用的公案小说，元代的《陈州粳米》、《硃砂担》、《蝴蝶梦》、《灰阑记》、《窦娥冤》等十余个杂剧，明代的《包公案》、《龙图公案》等白话判案小说。又如《晚明小品》一章述及古人以本草、药方形式写出富有情趣之文，所举之例，有唐张说《钱本草》，贾言忠《监察本草》，侯味虚《百官本草》，宋释慧日《禅门本草》，明袁中道《禅门本草补》，清张潮《书本草》（按药方所举例，省）。这是现在电子检索还做不到的，需要我们当代学人，排除外界的诸种干扰，安心读书做学问，才能有所获得。

承学先生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博通中外古今，书中好几处引及现代外国的哲学、文学理论著作，如论集句时，引述俄国美学家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美学原理；论《诗牌谱》，就随手联系西方文论中的意象研究，以美国学者华兹生对《唐诗三百首》所作统计为例。更让人感兴趣的是，《晚明小品》一章中论及作者自己立名的“意象式小品”，也即一连串的意象联缀而成的小品，这些意象有时看来只是杂纂而成，而实际上则有内在的联系，构成一种独特的艺术意境。作者写到此，特地举了现代作家汪曾祺的小说《钓人的孩子》一段描写。为提供我们搞古代研究的人欣赏，我这里把这段美文移录于此：

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小西门外。

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饼块。金钱火腿，牛干巴。炒

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甜酸苦辣咸。

这样的意象式字句，更能使人体味抗战时期昆明郊区一个普通小镇的独特景致。讲古代文体，引用现代文学创作，这不但是增加书中的文采，更使人得到沟通古今的启发。我过去在论述朱东润先生史传作品时，曾提到“朱先生的传记作品还有一种神来之笔，那就是在讲述历史时，忽然会把过去的生活拉到现代来，增进人们的时代意识与生活情趣”，并举《杜甫传论》中论及杜甫《严氏溪放歌行》，引及近代乐曲《二泉映月》，论及杜甫在江陵的遭际，联系法国雨果的小说《笑面人》（见《文学遗产》1997年第5期所刊拙文《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倾注》）。沟通古代文学与现代创作的内在联系，挖掘我们华夏民族的潜在文化意蕴，这应当也是我们古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命题。

我恐怕不能讲得太多，影响读者对这部佳作的研读和欣赏。我想再补充谈两点。一是作者注意过去不大受人重视的一些文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强调“文体其实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如论文字僻涩的先秦盟誓，指出“盟誓是中国古代历史最为悠久、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文体之一”；讲到具有神秘意味的谣谶和诗谶，说“它们具有某些其他类型诗歌所没有的文化内涵”；说古人的题壁、题树等题诗，“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的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一种寓有艺术色彩的人文景观”；讲到一向被视为政治文体的判文，说“判辞研究具有特殊的文化与文学意义”；对一向被视为臭文的八股文，说它是“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影响最大的文体之一”。这样从文化视角来探讨文体的产生、演变及社会意义，确能使人扩展视野，加深思索。另一点是书中对某些流行看法和传统观点，能独出新见。如论八股文，说八股文确影响明代文人和文学的创新精神，但又指出其理论却比较复杂，对于古代文章

学、技法理论产生的影响难以断然否定，并说作为科举的一种文体，八股文“确综合和融化了古代许多文体的特点”；又如这些年来备受人赞赏的晚明小品，作者在作了肯定论述外，提出其一个特点是“虽小亦好，虽好亦小”；对晚明清言，指出其思想内容的两重性，即：“清言所标榜的是清旷，而最终却容易使人走向平庸、世故和滑头。”这些都是使人惬意的中肯之论。

承学先生于四月中旬寄来此书书稿时，并附一信，信中有几句话，颇值得深思：“这里远离学术中心，在许多外地学者看来，此间不是做学问之处；而在此间世人看来，做学问乃是不合时宜之事。这两种看法都近于事实。既难以得到学术界的认可，也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所以学者在这里想真正做点学问实在具双重的困难和压力。也许正是这样，我的论文总是带有某种‘边缘’色彩和寂寞之音，格格不入时流。”这几句话我是完全能理解的。我觉得，像我们这样做古代学问之人，是不能与股票“联网”，与“票房”比值的。我们要有一种高层文化导向的自期，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承学先生那样的才具气派与情含雅致。人生总是有压力的，就我个人来说，二十几岁时就承受过难以想象的政治重压，现在也还不时有一些莫名其妙或所谓世态炎凉之压，根据我早年的经验，这就需要有一种“傲世”的气骨。我总是以为，一个学者的生活意义，就在于他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而不在乎一时的社会名声或过眼烟云的房产金钱。

关于广州的文化环境，最近我从上海古籍出版社送我的一本书得到新的启示。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今年年初出版一本大十六开本的图集：《十九世纪中国市井风情——三百六十行》。书中影印了十九世纪初期广州画铺中的画师绘制的所谓外销画，画师当时从营利出发，将各种题材的水彩水粉外销画绘制出来，销售并流传到欧美各地。这些外销画所表现的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片断题材，而画法却摹仿西方，现在看来十分别致，可以看出中西文化

交流融合的具体情景。这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可见在鸦片战争这个被作为中国近代史起点之前，广州的社会与文化风气已有一种相当西化的倾向。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走向是一个整体且相对独立的行动，并不完全受政治的制约和影响。陈寅恪先生早年所作的宗教史名篇论文《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就提出过一个论点，说两种不同民族的接触，“其关于文化方面者，则多在交通便利之点，即海滨港湾之地”，“海滨为不同文化接触最先之地，中外古今史中其例颇多”。对读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出的这本表现广州十九世纪初期三百六十行市井风情图集，更显得陈寅恪先生论点预测性和推导性之可贵。近二十年来广州的开放成绩显著，文化的活跃也有其他地区所不及的，吴承学先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他以寂寞之心钻研其所称之“边缘”，必将是一片为人瞩目的学术“新境”。——这，也是拙序的殷切期望之情。

二〇〇〇年六月中旬，北京六里桥
寓舍，时当数十年来未有之高温

绪 论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我们的先人创造了形式众多的文体形态。文体形态不断地创造和融合、更新与超越，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演变的主要原因和线索之一。可以这么说，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也是一部艺术形式的演变史。

文体学研究，既是古老的课题，也是崭新的学术领域。自魏晋以来，文体研究历来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许多文学批评其实也就是文体批评，如《文心雕龙》实际上就是一部文体研究的代表性著作。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研究虽然取得非常突出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5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重点不断在变化。新时期以前，文学研究明显带有政治化的倾向；新时期的初始阶段，古代文学研究在突破旧研究范式束缚的同时，又比较强调宏观的研究，而且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虽然也取得不少实绩，但对于文学文本与文学本体的研究还是非常不足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界中，对于文体形态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近年来，文体形态的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出版了不少文体研究专史与论文，对各种文体形态的研究在不断深入，文体学理论也出现一些可喜的成果，文体学研究成为新近学术热点之一。

我以为，文学史学科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史学、哲学的区别，就在于其鲜明的文学性，这是文学史学科的本质所在，也应该是

文学史研究的重点。而文学形式则是文学性的重要方面。我的研究目的是回归到文学自身，从文体研究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

在文学史研究中，文体史是有一定独立性的研究领域。文体史研究在价值取向以及理论、方法等方面，不仅应该有别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也应该与一般文学史研究有所区别。比如，文体史的分期不仅与政治史分期不同，与文学史的分期既应该有所联系也有所区别，因为文体史发展和文学史发展各有不尽相同的规律。虽然文体史与文学史研究都离不开对于作家作品的研究，但是文体史研究的重点却在把握各种文体形态总体的规范及其发展演变。文体史与文学史的视角有所不同，其价值判断也有所不同，有些作品在艺术方面水平并不高，在文学史上地位不高，但也许在文体形态方面有独到之处，在文体史上就有独特的地位。同样，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品，未必在文体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本书所研究的文体形态，其选取的根据主要是其在文体史上的价值。

本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受到西方学术的影响，而在古代文体形态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往往未能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古代原来非常重要的一些文体形态相当忽视。因为从现在的眼光看，古代许多重要的文体形态是“非文学”的文体形态，但是在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因此，我们的古代文体史研究，一定要从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的实际情况出发，避免以西方的文体形态分类学的框框来套用，削足以适应。

文体形态是作品的语言存在体，它是文本存在的基本要素。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忽视对于文体形态的研究，原因就是往往把文体形态看成只是无足轻重的形式。其实文体形态并不是纯粹的形式，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文本诸要素在相互作用中形成相对

稳定的特殊关系，从而构成了某一体裁的独特的审美规范。文体形态具有深广的语言学和文化学内涵，作为一种语言存在体，文体形态是依照某种集体的特定的美学趣味建立起来的具有一定规则和灵活性的语言系统的语言规则。文学的体裁及其体式规范是人类在长期文学实践过程中的产物，它从萌芽、产生到成熟往往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在这期间，个别作家的努力对于某些文体可能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或者有综合集成之功，但是从根本上讲，文体形态的形成及演变是集体长期创作实践和理论探索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文体规范是一种带有共性的语言规则。

社会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是文体发展的两大动力，这是研究文体发展史的线索。文体形态不是纯语言现象，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精神需求才是文体形态创造和发展的内在的原因。因此，文体语言形式的深层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文体发展与人类思维能力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有关系。人类在与自然及社会长期交往的历史中，形成艺术地感受和体验世界的心理图式和精神结构，而这些又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文体史从某种角度看，也是人类感受世界、把握世界的历史。文体具有特定的文化上的指向，文体指向一般说来与特定时代的文化精神是同一的。文体产生与演变也同样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所以文体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也是共通的。

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喜欢将某种文体作为某一时代的代表，有所谓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之说，这些说法往往容易失之简单化，事实上，同一时代某一文体的兴盛，并不意味着其他文体必然的衰落。不过，特定的文体在特定的时代发展到登峰造极却是不争的文学史实。在同一个时代中，也不是所有的文体都是均衡发展、地位相当，总有主导性的文体。人类的感官知觉的方式随着人类生存方式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感受方式和审美心理结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文体其实是人

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历史的产物，积淀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文体发展总是与时代精神感受方式相合拍的。时代和群体选择了一种文体，实际上就是选择了一种感受世界、阐释世界的工具。当特定的文体形式与群体和时代精神与感受方式相对应时，才受到群体和时代的接受，这正是文体兴盛的基础。^①

本书不是对于古代文体系统的概论，而是对于文体的个案研究。我力图在学术界现有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中国古代一些文体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的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相互影响等问题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研究观念上，除了研究文体的语言文字形式之外，以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全面研究古代文体的内部结构，文体的审美特征，以及文体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融合，文体发展的规律等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文体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的感受方式和审美心理以及文化心态。总之，对于文体所具有的深广的语言学、美学与文化学内涵及其所指向的文学史意义，是我最感兴趣的，也是我的研究重点。

^① 参考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目 录

序	傅璇琮 (1)
绪论	(1)
第一章 先秦的盟誓	(1)
第二章 谣谶与诗谶	(23)
第三章 策问与对策	(44)
第四章 诗题与诗序	(65)
第五章 留别诗与赠别诗	(87)
第六章 题壁诗	(93)
第七章 唐代判文	(112)
第八章 集句	(137)
第九章 宋代櫟括词	(157)
第十章 明代八股文	(174)
第十一章 晚明小品	(252)
第十二章 晚明清言	(287)
第十三章 文字游戏与汉字诗学	(307)
第十四章 文体学源流	(322)
第十五章 辨体与破体	(341)
第十六章 破体之通例	(359)
第十七章 评点形态源流	(376)
后记	(398)

第一章 先秦的盟誓

盟誓之文，是中国古代一种文体，虽然人们对此比较陌生，但实际上它是先秦时代最为常见的应用文体之一，在后代也有一定影响。《文心雕龙》中有“祝盟”一篇，并把盟誓列为“有韵之文”，颇为重视。本文以先秦的盟誓之文为主要对象，研究其文体体制及文化意义。

一

盟誓制度从萌芽到形成，应该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程。盟誓是从原始的诅誓咒语分化出来而独立的。最早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个体与个体之间，以后才逐渐应用于氏族与氏族、部落与部落之间，他们出于某些目的而缔结各种协议，为了互相取信，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对神祇作出遵守诺言的保证。盟誓的出现，是基于人们对于神祇的共同敬畏。只有这样，神祇才可能成为各方所承认的见证人和监督者。盟誓的核心内容就是对不守信者，将由神祇加以惩罚，降下灾难。盟誓的威慑力，正是基于当时人们对于神灵共同的崇拜与敬畏观念，盟誓给参盟者造成一种巨大的约束力与心理压力。在未有文字以前，最早的盟誓自然只能是口头形式，文字产生以后盟誓才逐渐有文字为据。盟誓文体形态也是由最早的口头上的简单誓辞，逐渐发展到比较完整的文本，并形成

正式的盟誓制度。

在春秋时期，战与盟是诸侯之间经常使用和交替使用的两种手段。诸侯与诸侯、大夫与大夫、个人与个人之间契约的执行，主要是靠盟誓来制约的。在此背景下盟誓也就成为诸侯之间一种非常重要和常用的活动，打开《春秋》三传，触目皆是诸侯之间的会盟与背盟的行为。^①“盟”字在《左传》出现 640 次；在《公羊传》中出现 162 次；在《穀梁传》中出现 172 次。“誓”字在《左传》出现 22 次；在《穀梁传》中出现 1 次，在《公羊传》中没有出现。^②可见“盟”字的使用比“誓”字频繁得多，因为“盟”实际上往往就包含了“誓”的内容。

诸侯之间的盟誓，正是社会发展到某种特殊阶段的产物。《春秋》隐公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穀梁传》释：“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日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五帝指传说中的黄帝、颡顼、帝喾、尧、舜。范宁说：“五帝之世，道化淳备，不须诰誓而信自著。”^③三王谓夏、商、周三代。范宁说：“夏后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会，众所归信，不盟诅也。”“二伯”指齐桓公、晋文公。《穀梁传》认为，此处特别记载盟的日期，是含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诸侯之间的盟，正是彼此之间互不信任的产物。故范宁解

① 参见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四《盟会例》、毛奇龄《春秋属辞比事记》卷二《会盟》，两书收入《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渊鉴类函》卷一百五十六《礼仪部三·盟会》等文献。

② 参考李波等主编《十三经新索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01 页、1830 页。据该书统计，在《十三经》中，“盟”字共出现 997 次，“誓”字出现 92 次。

③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1980 年版，第 2370 页。下引范宁语不再注。